

九旬憶舊

徐梅坤生平自述

光明日報出版社



九
旬
憶
舊

陳
雲

九 旬 忆 旧

——徐梅坤生平自述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58千字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700册

统一书号：3263·028 定价：0.40元

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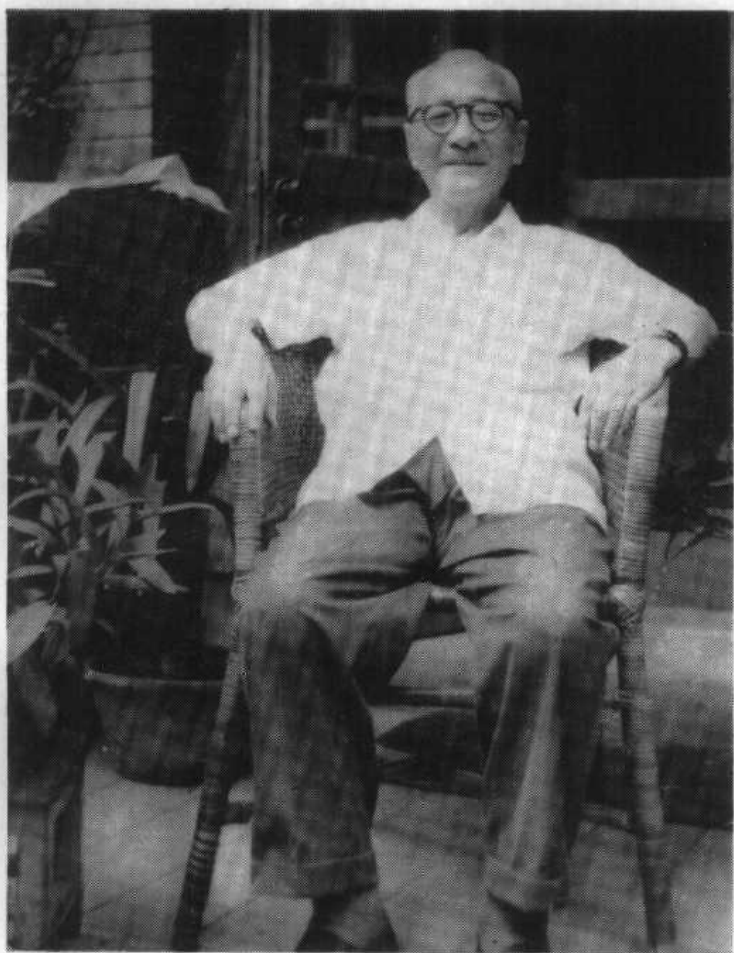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八月，当我九十周岁的时候，国务院参事室党小组的同志们给我送来了寿匾，为我纪念生日。这对我这个第二次获得政治生命的人来说，对党对同志们的这种关怀，内心充满无比兴奋和感激之情。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之后，在党外奔波了几十年，一九八二年我又重新回到党内。这种不平凡的经历，常常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许多老干部受到迫害，我们参事室的多数老人，由于周恩来总理的再三保护，总算幸免于难，那时的心情，忧虑重重。“四人帮”被粉碎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彻底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进行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平反了冤假错案，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就充满愉快和幸福之感。我由衷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信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将会越来越兴旺发达。

我虽然年过九旬，很快就要离去了，但我还总想为党的事业做点事情。“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不少党史工作者来访问我，我对来访者，尽量地回忆他们问的一些事情，帮助他们搞清一些问题。我想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从一九七九

年以来，肖甚和姜华宣同志多次来访问我，为了搞清一件事，他们不辞辛苦地到处访问、调查、查阅一些历史文献，这种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很愿和他们谈一些事情。但是，由于我说话不方便了，就让我的妻子帮助他们解释我的话，抄录一些材料。这样，经过他们的多次访问，并帮助我整理出我的全部回忆录，积累成这本《九旬忆旧》。这也算我为党做的一点工作吧！

我的老朋友陈云同志，在百忙之中，特为这本小册子题写了书名。在此，我衷心感谢陈云同志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徐 梅 坤



作者近影



浙江萧山衙前农民协会旧址。当年农民协会会员曾在此举行抗租大会



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庆祝大会，左起第三人为徐梅坤，中间讲话者为汪寿华

目 录

前 言

- 一、清贫家世
- 二、曲江工潮
- 三、衙前风云
- 四、加入中国共产党
- 五、上海早期工人运动
- 六、建立中共杭州支部
- 七、印行《向导》
- 八、参加党的“三大”
- 九、“五卅”运动前后
- 十、商务印书馆大罢工
- 十一、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 十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 十三、狱中八年
- 十四、寻找革命工作
- 十五、“在党外多做些工作”
- 十六、在中央化学玻璃厂
- 十七、迎接杭州解放
- 十八、从上海到北京

附记

肖牲 姜华宣

一、清贫家世

我叫徐梅坤，又名徐行之，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农历七月初一，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长山镇富家塔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

萧山位于钱塘江南岸，是浙北平原上一个交通便利、人口稠密的地区。但在旧中国，这里贫穷如洗，农民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土豪劣绅的重利盘剥，终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忍受各种欺压与凌辱。

富家塔是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距长山镇二里，距萧山县城七里，全村约有六、七十户人家，富姓是大户，村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家靠讨饭求生，是萧山一带有名的穷村。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雇农。祖父名徐玉书，是个佃农，靠租赁地主的几亩田过活，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祖父在洪（秀全）杨（秀清）时代当过太平军，村里人称他“老长毛”。叔祖父的名字忘记了，是打锡箔的工人，收入比农民多，在村子里盖了两间瓦平房，这在当时比大多数农民住的茅草屋要阔气多了。祖父去世较早，由父亲继承家业。父亲徐正福，是个忠厚老实人，他租了一亩半田，还兼做短工，我们全家五口人，全靠父亲累死累活地劳作，苦度天日。父亲有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三。老大也是打锡箔的工人，老二早年夭折了。因为我的叔祖父没儿没女，我父亲就过继给他做儿

子，但平日并没有经济往来，直到叔祖父去世以后，他那两间瓦房才归我们住。记得全家刚搬进瓦房的时候，我们高兴得真象发了疯。我的母亲姓李，她性情刚强，能吃苦耐劳，繁重的家务全靠她一人承担。我们弟兄三个，大弟徐照坤，比我小三岁，是锡箔工人，一九二七年病故了；二弟徐经坤，比我小四岁，是印刷工人，现在上海。

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劳动。我经常和弟弟一起，去钱塘江边割柴草，然后挑到长山、萧山去卖，挣几个钱帮助家里解决些生活困难。有时，当我挑着沉重的柴草上坡或过沟的时候，弟弟就在前面用绳子拉我。有一次，父亲病倒了，没有钱去请医生，妈妈叫我去向同族的一个富农借一块钱。为了这件事，我来回跑了七八次，最后才答应以高利借给。当我手里紧紧捏住这一块钱跑回家以后，竟抱头大哭了一场。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我非常痛恨那个世道上有钱的人。

十岁那年，家里让我外出学徒。临行前，妈妈叮嘱说：“不管多苦多累，一定要学满才回来，决不要半途而废。”我离开家到五十里远的戴村镇一家小酱油店去学生意，每天起早贪黑，各种脏活累活都要我干。三年满师后，老板要留我当伙计，并答应给我每月一块钱的工钱。可是，我说什么也不干，宁愿回家种田打短工。

十四岁那年，通过大舅介绍，我去杭州郭记订书作坊学徒。到那里后，不是真正学手艺，而是样样杂活都干，如劈柴、挑水、烧饭、擦灯、折书页、挑担送货。干了两年，我又回到农村做短工。

我正式学印刷工手艺是从十六岁开始的。清朝末年成立

谘议局，办学堂，全国各省都办起了官制印刷局。当时浙江省官制印刷局设在杭州扇子巷。他们从上海招来一百多名印刷技工，还计划招收几十名徒工，我就趁此机会进了印刷局，因自己不识字，不能学排字工，只好在铸字车间学浇铅版，做小工。后来，我就千方百计学识字，请人每天教我识一个字，代价是学一个字给一块糖，这样坚持一年以后，我已认得了几百个字。于是，我改做排字工。又过了半年，自己学会了排字。这对我一生，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阶段。

辛亥武昌首义，各地纷纷响应。上海租界地的各家报纸，尤其是《民权报》和《民立报》，言论十分激烈。每天上海报纸一到杭州，工人们就争相传阅。每当车间工人读报时，我就放下工作，专心倾听。晚上工余时间，我还要请人帮助读一、两篇重要消息或文章。这样，日久天长，我不仅养成了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而且思想觉悟也有了提高。

辛亥革命以后，全国新办了许多地方报纸，到处鼓吹革命，言论比以前自由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印刷工人奇缺。这时印刷工人的待遇都很高，我每月薪水在十五元以上。我是一个好争是非的人，经常为老板和工头虐待工人而打抱不平，同他们顶顶撞撞。一旦他们不接受意见，我就忿懑而去，所以我很难在一个地方呆较长的时间。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到五四运动前的六、七年间，从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到江苏的上海，无锡等城市的印书馆、报社，我几乎都跑遍了，并且结识了很多印刷行业的工人朋友。

在旧社会制度下，齷齪不公的事，比比皆是。我曾一度想当新闻记者，利用报纸向人民大众揭露军阀的黑暗统治，但终因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而未能如愿。

二、曲江工潮

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迅速传到杭州，在省城里也发生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活动。当时杭州已出现了行会组织，如土木、泥水工人有“鲁班会”，成衣工人有“轩辕会”，他们的游行队伍整整齐齐，很有声势。可是，我们印刷工人虽有文化，又易于接受新思想，游行队伍却不如泥木、成衣工人，稀稀拉拉，缺乏生气。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统一的组织。从这开始，我便产生了将印刷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人团体的念头

“五四”前后，国内宣传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很多，这些书大多浅近易懂，可能这也是当时一般人容易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原因之一吧。我曾看过几本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主张毁工厂、杀厂长，觉得很痛快，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思想。

一九二〇年初，我在浙江印刷公司当印刷工人。为了把杭州印刷工人组织起来，我在全城印刷厂、报馆的工人中奔走联络，向印刷工人说明，要组织工会，以增进团结，加强力量。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大多数工人的赞同。于是，我和倪忧天共同发起筹备杭州印刷工人团体——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倪忧天原是杭州印刷工人，到浙江印刷公司以后当了职员，他同老板比较接近，我同工人的关系较好。工作

互助会开始只有十九人加入，通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全市各报馆、印书局的职工大都参加进来。一九二〇年七、八月间，召开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立大会。会上，倪忧天当选为总干事，我担任宣传股长。陈豪谦、田恺等，都是互助会的负责人。

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创办《曲江工潮》。钱塘江也叫曲江，因杭州位于钱塘江畔，故大家商议创办的工人刊物定名为《曲江工潮》。这是一种小型的工人报刊，创刊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每月两期，公开发行，每期印数约二百份，共出了十几期。它不仅是浙江工人的第一张报纸，也是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我负责报纸的出版工作，倪忧天为《曲江工潮》写了刊头题字。编辑是请浙江一师学生担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当时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一样，闻名于全国。在五四运动“学潮”中，浙江一师涌现出许多知名人士，如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和施存统等。我们请一师学生陈乐我和魏金枝做编辑，他们也是主要撰稿人。一师学生钱耕莘（耿仙）、查猛济等也经常为《曲江工潮》写文章。陈乐我是诸暨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魏金枝与陈乐我是同学。《曲江工潮》上的文章，多半是一师学生写的，还有些是工人写的，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刊物上的文章内容很庞杂，有的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罪恶与黑暗；有的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同资本家作斗争；有的宣传无政府主义；有的宣传学文化；也有的提倡女权；还发表一些小说和诗歌。《曲江工潮》当时曾轰动了江浙地区。大约不到一年，因浙江印刷公司工

人罢工，《曲江工潮》无人具体负责而停刊了。在《曲江工潮》终刊前后，倪忧天和宣中华赴苏俄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倪忧天走后，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改由我负责。

第二件事情，领导罢工斗争。浙江印刷公司有一百多个工人。有一次，公司总经理周佩芳的一个做小工的亲戚，无故打了一个排字学徒工，引起全公司工人的无比愤慨。我以公司工作互助会的名义提出抗议，要求总经理的亲戚向被打的徒工赔礼道歉，但总经理不肯接受，我们就号召工人罢工。第二天，排字工首先起来罢工；印刷、装订、铸字、照相制版等工人也相继罢工。浙江印刷公司本来承印省政府公报和法学、医学等校的讲义，罢工后，这些生意都改由其它印刷厂承办了。为寻找生活出路，我们将公司大部分工人介绍到其他印刷部门工作，只留少数工人坚持罢工。这是我们领导的第一次自发性罢工斗争，因经验不足，罢工坚持了四十多天，浙江印刷公司就关闭了。这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发生的事情。

印刷公司罢工失败后，我改换姓名叫沈成，扮成乞丐进了浙江省立贫民习艺工厂当艺徒。我在印刷公司工作时，曾到这个厂参观过。该厂座落在杭州藩司前，有二百多个十二岁至十六岁无家可归的孤儿。厂里有织袜、毛巾、摇纱、印书、订书等工种，完全是用手工操作的旧式机器。按规定，这里的工人每天可以吃两餐干饭，一餐稀饭；夜班加两个铜板点心钱；每逢初一、十五下午不做工。可是，这些规定都没有实行。艺徒们每天只吃两餐稀饭，饿得心里发慌；夜班不加发铜板；初一、十五两个半天也不让休息。除此之外，艺徒每

天工作时长达十二个小时以上。厂长对工人在其它方面的压榨也很厉害，艺徒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厂长有两只心爱的狗，每天喂牛肉、白米饭。工人的状况真不如资本家的狗。我到贫民习艺工厂后，先暗中串联几个年龄较大的艺徒，同他们一起商议如何要求改善生活，然后靠这些骨干分别联系其他艺徒，逐渐将全厂艺徒都联系起来了。艺徒们的决心很大，表示：如果罢工失败，宁愿去讨饭。一九二一年冬初，艺徒们开始罢工。这次罢工得到当时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的支持与帮助。沈是浙江省议员。在他的支持下，我带领艺徒们到省议会去请愿，要求改善待遇，每天伙食“两千一稀”；初一、十五两天有荤菜；不做夜工；不准打骂徒工。我们所以向省议会去请愿，是因为贫民习艺工厂是经省议会通过，由省政府拨款办的。当时，省政府同省议会之间有矛盾，我们利用这个矛盾开展斗争，结果取得了胜利。省议会被迫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几项要求，工人生活有了改善。请愿胜利后，我又想杀掉厂长，准备自己去自首，结果只把厂长的一只狗杀了。第二天事情暴露以后，厂当局要来捉我。我在几个艺徒的帮助下，搭人梯越墙逃回到家乡萧山。

三、衙前风云

我跑回家乡后，给人家做短工、车水、耘田、治苗。劳动时，我常与农民交谈，向他们说明地主太凶狠，我们一年四季辛辛苦苦，收成全叫地主拿去了，这世道太不公平了，应该组织起来进行抗租斗争，改变这种状况。

这时，萧山地区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建立起几十个农民协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减租抗捐斗争，这是我们党领导的最早的农民运动。这次农民运动的发起人是早期共产党员沈玄庐。他最早在衙前搞起了农民协会，影响了周围许多乡村也都自发搞了起来。沈玄庐的父、祖两辈都是萧山有名的大地主，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产，家里设有游泳池，十分阔气。沈玄庐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当过警察局长，又是浙江省议员，有钱有势。五四时期回国后，沈玄庐与戴季陶、李汉俊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并参加了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的早期共产党小组。他还将自己家的田交给农民耕种，这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在沈的资助下，衙前办起了农村小学，聘请杭州一师毕业学生宣中华、杨之华、徐白民等担任教师，这几位小学教师不久又组织起“农民协会”，东乡（衙前属东乡地区的一个镇）全乡和北乡大部分农民，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主要领导人是李成虎，他是衙前人，当时已有四、五十岁。

一九二一年八、九月间，我从衙前带回一份《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大家争相传阅，个个喜笑颜开，以为有了这份宣言，就可以不要交租了，所以到衙前来要宣言的农民很多。这份农民抗租宣言就是沈玄庐组织衙前农村小学教师写的。

这时，我在乡里也初步建起了农民组织，有二、三十人参加。我们决定那一年交“对折租”（原租每亩一石二斗，只交六斗）。因为有了组织，大家容易心齐，认为要吃官司一起去，监牢里关不了我们这么多人。由于我们乡有组织的农民开头没有交租，影响周围许多乡也都不交租了。这一行动，吓坏了城镇里的地主，谁也不敢第一个下乡收租。后来，县商会会长高云卿的儿子第一个下乡来收租，他在江西九江当过检察官，仗势欺人，开口就要八五折开斗，我们坚持交对折租，他蛮横地令帮凶们动手卸米，我们就将他拖到空地上，狠狠地痛打一顿，他便狼狈地逃回城里去了。不久，地主被迫贴出告示，同意今年可以一律六折交租，农民要安心种田，但必须依法严惩那些鼓动抗租暴动，扰乱治安的肇事者。过不几天，城里派出一个连的兵来抓我，在佃户们的帮助下，我隐蔽起来逃脱了。这一年，萧山东乡、北乡的农民，普遍交了六折的租，这真是破天荒的一大胜利。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的一天下午，衙前周围几个乡的农民约二百人，在衙前东岳庙（也叫关帝庙）召开减租示威大会，我带领本村二十多个农民分乘四只船赶来参加。衙前小学没有派人来主持这次大会，我就自告奋勇出来主持，并第一个发了言，叫大家不要害怕，敌人来只能抓几个人，不能把我们都抓走。接着，沈玄庐的叔父发言。第三个发言的是李成